

儒林羣丑的諷刺画卷

——評吳敬梓的《儒林外史》

全椒縣
縣直地
縣地直
安徽大學

《儒林外史》評論組

安徽大學學報增刊

一九七六年六月

序 言

十八世纪中叶，清王朝的乾隆年间，曹雪芹在北京正写着伟大的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吴敬梓在南京写出了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吴敬梓的成就虽比不上曹雪芹，但他与曹雪芹一样，与当时的进步潮流相适应，以自己创作的血肉饱和的艺术形象，参加批判衰朽的封建制度、促使封建社会“天崩地解”的斗争，并与曹雪芹共同把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鲁迅先生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鲁迅语录，均见此书）。给这部小说以很高的评价。他又指出：“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象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鲁迅的话是感慨很深的。象一切进步的古典文学作品一样，《儒林外史》问世以后，剥削阶级反动文人围着它嗡嗡狺狺，发了不少议论，他们的反动立场，决定了他们都不可能真正懂得《儒林外史》，而总是千方百计歪曲它，贬低它。

还在《儒林外史》出现不久，封建文人就用以假乱真的办法，在版本上大作文章。他们或则狗尾续貂，杜撰一个第五回，或则在书中抵制科举和热中科举的两种士人，冰炭同

炉，同受皇帝赐以进士出身，荣登“幽榜”。或则掺假“增补”，在第四十三回后臆入四回，把叛逆女性沈琼枝丑化为女市侩、女流氓，象鲁迅说的，“事既不伦，语复猥陋”。这两种版本异曲同工，都是妄图抵销《儒林外史》对科举八股和封建礼教的批判，磨灭它的反封建锋芒，实际上是对《儒林外史》的反动。

帝国主义的文化掇客胡适，更以买办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奴颜媚骨，蓄意贬低《儒林外史》。它的思想内容被缩小为仅仅描写“八股秀才”；它的社会历史意义被限制在“康熙大师死尽而乾嘉大师未起的过渡时期”；它所概括的生活形象被看作是作者家世的简单叙录，而它的作者被诽谤为秦淮河上的嫖客；它的精湛艺术被污蔑为“没有结构”的“杂凑”。

建国以后的《儒林外史》评论，在对某些问题的分析上，虽不乏正确的见解，但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胡适的反动影响并没有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沉渣，往往点缀着马列主义的词句，继续浮现。革命导师列宁谈到俄国古典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时曾经说过：

“为了使他的伟大作品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必须进行斗争”，“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尼·托尔斯泰》，《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二一页）要象鲁迅所希望的那样，让人们真正懂得《儒林外史》，同样必须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深入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同时认真解决怎样阅读的问题，真正做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使广大人民更好地理解它，利用它，以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

《儒林外史》把故事的主要背景假托在明代成化末年（一四八七年）以后的一百零八年中，其实，正如鲁迅所说，作者是“多据自所闻见”，加以提炼概括，反映的就是他当时的社会现实。全书写了近两百个人物，而“机锋所向，尤在士林”，激烈地“攻难制艺及以制艺出身者”。鲁迅的这些精辟见解，清楚地说明：“儒林”——封建士大夫阶层，包括儒家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官绅，是《儒林外史》描写的主要对象，以八股制艺取士的科举制度，则是《儒林外史》批判的中心。

科举制度是封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在政治上的反映，是与封建法权相适应的。科举制度中秀才、举人、进士这些学业的等级，也就是社会地位的级别，它们分别享有相应的封建法权。明清秀才的特权，顾炎武在《生员论》中作了如下概括：“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具体说，在经济方面，首先就可以免去户内二丁的差役，还可以由地方官奏销豁免粮赋。秀才考得好，可以做廪生，从儒学领到相当数量的廪膳费。在法律方面也受到优待，秀才犯法，如不是重罪，只由儒学处分了事，在学校除籍之前地方官不得用刑。在政治地位方面，秀才已入了“绅衿”之列，允许使唤奴婢，见了知县可以平起平坐，不下跪，因为有了接近官府资格，因此也就可以包揽隐庇或仗势欺人。秀才再爬上一个阶梯，中了举人，叫作“发了”，称为“老爷”，这是承认他已具有“官”的身分了。知识分子只要有了这个资格，即使不做官，也已挤入特权阶级，财产、权势便接踵而至，范进中举后的发迹变泰，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如果再爬上一个阶梯，考中进士，那就可以在翰

林院或中央政府的六部任职，并为以后进一步的飞黄腾达铺平道路。《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道出了科场士人醉心举业的真实原因。

吴敬梓的时代，还没有封建法权的科学概念，他认为正是科举制度，引诱士人不顾“文行出处”，去追求“功名富贵”。在《儒林外史》里，他生动地描绘了儒林群丑怎样以八股制艺为敲门砖，沿着科举制度设置的阶梯，“舍着性命”往上爬的种种丑态。我们今天可以从中看出，这正是封建统治者通过科举制度，把“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教育思想制度化，诱使知识分子沿着这条法定的读书做官的道路，去攫取封建法权，挤进“劳心者”、“治人者”的行列，成为维护日益腐朽的封建制度、顽固开历史倒车的反动官僚政客；即使爬不上去，也总是心存侥幸，俯首帖耳甘当反动统治的忠顺臣仆。科举制度不仅是封建教育的核心，而且是封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吴敬梓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封建政治的一种批判，是倾注着作家要求改革，要求前进的进步思想的。

明清的八股科举，与孔孟之道的发展形态程朱理学互为表里，它规定用《四书》、《五经》命题，并以朱熹的解释为标准，要读书人揣摩儒家经典，“代圣贤立言”。实际上它是强制推行官方哲学——程朱理学、强化封建思想统治的一种工具。《儒林外史》批判科举八股的时候，必然要触及与这个制度相互为用的程朱理学的溃疡。那些在举业的牧场上狼奔豕突的儒林丑类，正是由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毒汁喂养出来的儒家之徒，他们热中功名、利欲熏心的丑恶言行

和虚伪矫饰、横行霸道的狰狞嘴脸，正是儒家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的人格化表现。虽然吴敬梓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的毒害，还不能决然剪断与儒家思想联系的脐带，他在作品中通过一些“真儒”形象，把“礼乐”、“仁义”、“孝悌”、

“文行出处”之类的儒家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加以理想化，当作改良政治和敦品励行的救世良方，但正象鲁迅指出的，他“束身名教之内，而能心有依违”。由于自身社会地位的下降和时代先进思潮的影响，他对于儒士和浇铸他们灵魂的程朱理学，有着深切的体察和不满，对儒家思想的某些方面，有所违背，有所突破。在《儒林外史》里，他以酣畅淋漓的笔锋，剔肤见骨地解剖科场士人的五脏六腑，象鲁迅说的，做到“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并掊击了封建礼教和“习俗”的“伪妄”，赞扬带有离经叛道色彩的人物，这些都为我们认识儒家思想的反动本质，提供了生动的批判材料。从这种意义上说，《儒林外史》是具有反儒倾向的。

科举制度既是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它与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方面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一种取士制度，它与各级政权机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作者要认真、深入地揭露和批判科举制度，就不能不批判从科举出身的官僚，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封建政治的许多重要方面。再从作者的主观认识来看，从清初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颜元等，一直到吴敬梓，都把科举的流弊与封建末世的衰风颓运联系在一起考察，探寻“国之盛衰，时之治乱”（顾炎武语）的原因，这就使他们对科举的批判，往往触及到封建制度的某些本质方面。吴敬梓就象鲁迅说的，

“秉持公心，指撻时弊”，对当时社会的弊端作了广泛的揭露。《儒林外史》在展开儒林画卷的时候，随着各种士大夫

的不同遭际，也就把批判的锋芒射到了封建社会的许多领域。通过侥倖当官的八股幸运儿，把笔锋捅进官场，批判了基层“父母官”和阁部大僚的昏愤无耻，封建官僚机构的腐败残暴。通过有功名的乡居士大夫，鞭挞土豪劣绅的恶德恶行，触及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通过假名士招摇撞骗、沽名钓誉的丑恶行径，针砭科举颓风所造成的恶劣社会风气。作为儒林活动的背景和影响，也接触到城市平民的生活和农民的疾苦。凡此种种，使《儒林外史》超出了单纯批判科举制度的范围，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

上述三个方面：批判科举制度，嘲讽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揭露封建政治的腐朽黑暗，就是《儒林外史》在思想内容方面的主要成就。虽然作者还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他指揭痼疾，是为了企图疗救封建社会的沉疴，而且他开出的药方是荒谬的，但他对病情的认真揭举，却暴露了封建肌体的不治之症，使人们对它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从而达到了批判封建社会的总效果。因此《儒林外史》是具有反封建的政治倾向性的，在“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六三四页）的封建末世，它显然具有进步意义。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有分析有批判地把这部小说当作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来读，就可以收到**古为今用**的积极效果——

它对封建制度的广泛揭露，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地了解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妄图搞复辟倒退，把社会主义的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去，中国人民是决不答应的！

它对孔学的辛辣嘲讽，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地认识儒家

思想的反动本质。孔孟之道不但是历史上一切反动派倒行逆施的思想武器，也是修正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党内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要从孔家店后院的垃圾堆里，寻拣毒害人民、破坏革命的思想武器。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革命就必须批孔，反修就必须批孔。

它对科举制度及其指导思想“学而优则仕”的深刻批判，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批判反动教育思想和剥削阶级法权的重大现实意义。一切剥削阶级的法权，都以维护私有制，维护剥削阶级的特权，维护等级制为共同特征，因此，它们之间总有某种继承性。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法权形式的很大一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四八页）。科举制度所体现的等级制度，资产阶级及其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就千方百计要加以保存。他们总是要极力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包括一切从封建阶级继承下来的法权和法权思想。刘少奇全盘继承了儒家反动的教育思想，鼓吹“学而优则仕”的翻版“读书做官”论。他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制度，虽然形式和科举制度有所不同，但“学优登仕”，攫取剥削阶级法权的根本指导思想，却与科举制度别无二致。林彪反党集团十分欣赏历代反动派“以饵取鱼”，“以禄取人”的反革命统治术，居心险恶地宣扬什么“诱：以官、禄、德”，梦想重演科举制度的故伎，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用资产阶级法权栽植腐朽反动的“儒林”。今天，刮右倾翻案风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又极力反对拆掉“学而优则仕”这架梯子，想把学校，特别是大学，变成爬上精神贵族楼阁的阶梯，以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三大差别，为复

辟资本主义培植社会基础。联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现实读一读《儒林外史》，可以从中汲取阶级斗争的经验，把历史的斗争与现实的斗争结合起来。我们要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为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

一 时代和作者

十八世纪中叶，清王朝康熙、雍正、乾隆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由兴盛走向衰亡的转折时期。在这时期，杰出的古典小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先后产生。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第八一七页。本书引文均据此版本，以下不再注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一样，它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和阶级斗争的产物。

封建社会的末世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世。清王朝在它的第二个皇帝康熙统治下，一度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他在军事上，对外击败了沙皇俄国的蚕食侵略，保卫了祖国的版图，对内削平了三藩的割据叛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在经济上，采取了例如停止圈地、减免赋税、推行垦荒、兴修水利等积极措施，也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全国统一，人口增加，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业产品日益丰富，这一切在表面上呈现着繁荣的景象，也即是后世封建史学家所讴歌的“盛世”。但是这种繁荣是在国内封

建地主经济面临变革的前夜，封建的专制政治即将崩溃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当时，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愈演愈烈。

清王朝十八世纪中叶的经济繁荣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但是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财富，经不住封建统治阶级敲骨吸髓的剥削和穷奢极欲的挥霍。据昭槁的《嘯亭续录》卷一说，清百余年来，豪富之家相当多。如北京姓祝的，姓查的，姓盛的，屋宇多至千余间，园亭壮丽，游观十天还不能完毕。这是北方的情形。那末南方呢，钮琇的《觚賸》卷五说，江南泰兴官僚地主季沧苇庭院周匝数里，住宅雇守卫六十余人，月粮以外，每夕赏高邮酒十甕，烧肉三十盘。婢女每人装饰值银数千两，早晨要饮人参龙眼汤。某次晒毛衣，紫貂、青狐、银鼠、金豹、猢猻一类贵重皮货，遭霉气脱毛积地，厚三四寸。地主官僚恣情享乐的生活是建筑在劳动人民的痛苦之上的。最高的王朝统治者抢占田庄，横征暴敛，加捐派税；府州县各级官吏又乘机层层加码，贪污成风。《儒林外史》第八回写南昌太守王惠一上任，就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做官发财“诀窍”，把个衙门搞得满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使合城的人，……睡梦里也是怕的。”这种描写对照当时黑暗统治的现实，一点也不过分。

同一时期，官僚地主兼并土地也在剧烈地进行，结果弄得民穷财尽，四海虚空。康熙四十三年“上谕”自己承认：

“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那时代的进步思想家唐甄说：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是四空也。”（《潜书·富民篇》）这是康熙时的情景。到了雍正、乾隆时期，大贵族、大官僚、大地

主“田多者一家而占数甲（里甲）”，出现了“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百人而不一顷”，富者“膏腴万顷”，贫者“沦为佃耕之户”的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而在吴敬梓生活的江淮地区，贫苦农民尤其不堪忍受丁税的剥削。“丁之害莫甚江以北、淮以南”，一县的丁税，十分之九都摊在无田的农民身上，使他们“既无立锥以自存，又鬻妻子为乞丐以偿丁负。”广大劳动人民就这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遇天灾人祸，（如掘堤造成黄河、淮河水患）贪官污吏还来乘机大捞一把，这就更加重人民的苦难。《儒林外史》第一回有一段黄河决堤，官府不管，沿岸人民逃荒觅食的情节，就反映了当时百姓遭殃，辗转沟壑的惨境。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纠结在一起，这时候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运动如白莲教、天理教的起义，山东王伦的起义不断爆发。《儒林外史》所写的“山东道上的响马”“扬子江上二百只小船抢盐”，都透露了清王朝“太平盛世”帷幕下阶级斗争的音信。

毛主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毛泽东选集》第五八九页）封建社会到了清朝康、雍、乾时期，已经进入衰老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突破封建统治急速地发展起来了。当时的丝织业、棉纺织业、制瓷业、冶铁业，都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作坊和手工业工场，商业也随之繁荣起来。根据李斗《扬州画舫录》和余怀的《板桥杂记》记载，吴敬梓那时经常居住的南京和扬州等东南大城市是十分繁荣的。市民阶层的逐渐形成，自然在封建社会内部又增加了一种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力量。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宣扬“四民以士为首，农次之，工商其下也”，对工商业采取打击扼杀的政

策，必然引起市民的抗争。当时苏州、江宁、扬州、福州、杭州、广州等地，都曾发生市民罢市、闹衙、抗官、索犯的斗争，市民阶层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

这一切说明，当时不仅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趋激化，而且新兴市民阶层同反动没落的地主阶级的斗争也愈趋发展。阶级斗争又进一步加深和激化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加速了它的分化。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正在经历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是一个即将发生“天崩地解”的时代，封建制度灭亡的丧钟敲响了！

反映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同样激烈和尖锐。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他们的封建专制政权，加强思想统治，采取了镇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政策。一方面，大兴文字狱，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朝代，先后有庄廷钱《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汪景祺《西征随笔》案，钱名世“作诗”案，查嗣庭“八股试题”案等等，每案株连处死流放的有几十人、几百人之多，搜查与焚毁书籍达数千、万部。虽然，从总倾向看，康熙对历史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但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他也提出“黜异端以崇正学”，抬高程朱的地位，把朱熹尊为“十哲之次”。随着地主阶级日趋没落，雍正、乾隆更是变本加厉尊儒重道，尊孔读经，把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造成“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朱彝尊《曝书亭集·传道录序》）的文化专制局面。另一方面，沿用明代以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给天下知识分子规定一条读书、考试、做官、发财的道路，用孔孟之道桎梏人们的思想，用封建法权腐蚀人们的灵魂。

但是，黑暗的思想统治，阻遏不住进步思潮的产生和发

展。正是在清代康、雍、乾的时期，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黑暗和腐朽的本质日益暴露。这就激起那些代表中小地主、工商业地主利益的知识分子对它的不满和批判，特别是由于新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更使得当时反抗黑暗统治的进步思想多少带上了初步民主主义的色彩。当时进步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以及颜元、李塨（世称颜李学派）和戴震等，都从不同方面，对封建主义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和封建主义的君主制度、科举制度，以及男尊女卑等腐朽的伦理道德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封建社会末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代表没落的统治阶级的程朱理学和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进步思想潮流之间的冲突，科举制度的弊端以及人们对它的批判和抵制：这一切对吴敬梓思想都有着深刻影响，也给他的《儒林外史》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内容。

《儒林外史》主要对封建的科举制度进行了讽刺和批判，它蔑视和嘲笑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学而优则仕”的孔孟之道，客观上起了反儒的战斗作用；至于它揭露士林形形色色的丑态，官场零零总总的罪恶，以及对受压迫剥削的农民的同情，对自食其力的手工业者和市民的歌颂，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阶级斗争，影响和推动作者敢于正视现实，反映现实，写出一部向封建秩序挑战的小说。

时代就是这样哺育了作者，作者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

嶽 崎 磊 落 的 一 生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字敏

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移家南京后，又自号秦淮寓客，亲友后辈或称他为文本先生。

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夏季的一天，他诞生在几代以科举做官、剥削起家的全椒襄河湾的老窑故宅。

吴敬梓曾经追叙他家世的富贵，说是来往的宾客坐着华贵的车子，奴仆穿着锦绣的服装，家中广有田地，山林和货殖。（“宾客则轮毂朱丹，奴仆则绣黼妆靚；卮茜有千亩之荣，木奴有千头之庆”。《文本山房集：移家赋》）词赋的语言，固然难免夸大，但由此可以推断，他家祖上剥削量之大，是惊人的。

吴敬梓的远祖曾在明代永乐帝时，任过禁卫军的头目，因为‘保皇’有功，受封为骁骑户爵，在江苏的六合县。他的曾祖，祖父辈，大都是清初的大官。不少人中过举人、进士，有的还是榜眼（一甲二名）、探花（一甲三名），任过翰林院编修、侍读、国子监司业、中书舍人、学政、县令、州同知等官的不计其数，由于官运亨通，便把他的家庭推向功名富贵的顶峰。正象吴敬梓所总结的：“五十年中，家门鼎盛”；友人王又曾也说：“国初以来重科第，鼎盛最数全椒吴！”（《丁辛老屋集》卷十二）。

吴敬梓从小受着父、祖的教养，养尊处优地生活在“遗园”、“探花宫”和“赐书楼”中，过着“笙簧六艺、渔猎百家”的读书生活，成为从早到晚爱好书籍的“书淫”，他特别喜欢阅读稗官野史（小说之类）和一些不准公开的书籍，很快成为诗词歌赋无一不能的才士。

吴敬梓的父亲吴霖起，晚年出任赣榆县教谕，把儿子带到任所。他授课四时变异，丰富多采，又曾破产修理学宫。

“天将以为木铎”，当时的学童对吴霖起敬佩得不得了，他

对吴敬梓的影响是很大的。吴敬梓十四岁跟随父亲走出故乡，广阔的大自然，使他开展了视听，扩大了胸襟，也培育和丰富了文思。当他登上高阁，俯视碧海，仰观青天，便再也抑止不住奔腾澎湃的思潮而放情歌唱了。那时他创作了收在《文木山房集》中的第一首《观海》诗：

浩荡天无极，潮声动地来。

鹏溟流陇域，蜃市作楼台。

齐鲁金泥没，乾坤玉阙开；

少年多意气，高阁坐衔杯。

豪迈的意境，飞扬的情思，从这样一首诗可以看出，吴敬梓在少年时代就开始显露出文学才华。

吴敬梓的父亲在赣榆任教官期间，尽管尽心教学，出钱卖力，但不能适应当时官场阿谀逢迎、拉拢排挤的风气，得不到上级的好感，干了八年教谕，最后还是丢了官，带着二十二岁的儿子回到故乡，从此抑郁不乐，就在次年得病死了。父亲的死对青年吴敬梓刺激很大，他开始窥见官场斗争的现实，初步认识了世人的真面目。

父丧之后，又遭家难。当时近房的无赖之徒，看到吴敬梓是两代单传，人孤势弱，便率领打手，贪狼似地闯进他的门庭，要攫夺他祖遗的财产。他目击家族纷争及其它种种丑态：兄弟内斗，亲族外骂；有借先人的声望，欺凌乡人；有嫁女多索财物，成为买卖；有依势攀附高门，横行乡里。

“君子之泽，斩于五世”，封建末世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这一切又给吴敬梓思想上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在《儒林外史》第六回写严家兄弟立嗣的情节，就注入了作者的亲身感受和愤懑。

当时全椒，由于地近南京，受到政治气候和工商业的影

响，奸商市侩，充斥市面；官僚缙绅，狼狈为奸。就象《儒林外史》所描写的“五河县势利熏心”：只怕官大财多，嗤笑李杜式的人物，任你一肚子学问，总不许开口，闹得黑云压城，乌烟瘴气。而吴敬梓是败落世家的秀才，“家本膏华，性耽挥霍”，为了周济贫困，一再出卖田宅。这就在势利熏天的环境之中，同儒林群丑、奸商市侩，形成尖锐的对立，遭到世俗的非议和毁谤。开始时有貌似关怀的长老讥笑喃喃，接着乡绅们把他作为反面榜样，“传为子弟戒”。但他毫不介意，仍然“我行我素”。对长老们的诬蔑，报之以竖起双眉，发出虎声，叉手谢绝！从兄吴槩写诗曾经提到：

“弟也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虬。”（金槩《泰然斋诗集》卷二）

吴敬梓和世俗势力的矛盾加深了，但并不完全是孤立的。近房中就有爱好文学的从兄吴槩同他相处很好；又有桑根山下表兄金槩、金两铭兄弟以及里人章晴川、江东罗锦宣等经常往来。他们都有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又很有学问。经常在一起聚会，“唱酬之盛，甲于江淮”。而他们之中，尤以吴敬梓为放浪不羁。有时候吃醉酒，发出狂叫，表露他愤世嫉俗的感情。他还采取各种方式，同儒林群丑作斗争。他写诗诈称沈约的作品，吓得那些“矫饰”的名士目瞪口呆。一次考官降临，神气十足，吴敬梓就迎上前去说：好了，你现在是考官，我就率性提出孟子“灭国五十”的问题，让你解答，结果难倒了考官，他就哈哈大笑地走开了。青年时代的吴敬梓就是这样地孤标傲世，不同流俗。

吴敬梓对于科举制度由失望到怀疑，以至最后从理性上认识到它的腐朽黑暗，是有一番亲身经历的体验和认识过程的。半个世纪的“家门鼎盛”，吴敬梓在童年时有所见闻。